



江西派诗选注

陈永正选注

中山大学出版社

江西派诗选注

陈永正选注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0千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500册

书 号：10339·11 定价2.40元

古典文学阅读与欣赏丛书编辑说明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诗骚史汉、李杜元白、韩柳欧苏，到关王汤孔的戏曲，罗吴蒲曹的小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反映。数千年来，我们的诗人、作家以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和卓越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串串明珠般的灿烂篇章。为了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社编辑出版了我校古文献研究所主编的这套丛书。

《古典文学阅读与欣赏》丛书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选题角度力求新颖，词语注释力求简要，思想评析力求辩证，艺术鉴赏也力求对读者有所启发。为了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江西诗派是宋代文坛上的一个文学流派。

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诗人，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诗歌理论，总结出一套可以衣钵相传的创作方法，形成大体相近而又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因而演成一个能左右较长时期诗风的宗派。

自北宋末叶以及整个南宋时期，不少有成就的诗人，在诗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直至清代，其流风余韵依然未绝，同光体诗人所提倡的“宋诗运动”，也就是对江西诗派的发掘、继承和总结。

首先提出“江西诗派”这个名称的，是北、南宋之交的诗人吕本中。他仿效佛教禅宗各立门户宗派之法，作了《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庭坚作为诗派的创始人，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鍳、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覩、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他在图序中说：“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惟豫章（指黄庭坚）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覆，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他把江西

诗派作为宋诗的代表，并认为是李、杜（主要是杜甫）的直接继承者。吕本中虽然没有把自己列名图中，后人自然也把他补了进去。后杨万里又以曾几、曾思二家补为“江西续派”。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撰《瀛奎律髓》，崇奉江西诗，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另外，南宋初年著名的诗人曾几，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江西诗派诗人。南宋后期的诗人赵蕃、韩淲以及方回，后世都把他们看成是江西诗派的继承者。在北宋还有一些诗人，如张扩、僧惠洪、吴则礼、范温、芮烨等，都受到江西诗派诗人（特别是黄庭坚）较深的影响，他们的诗论和诗风也确实与诗派中人相似。

可以这样说，江西诗派是个纯粹的文学流派，它是一些有志于研讨“诗法”，并积极付诸实践的诗人形成的流派。诗人们对诗歌艺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尽管诗派中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内部成员也很复杂，诗人各自的诗论与诗派的共同主张或有矛盾，彼此的创作风格也有不同，我们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诗家派别。这个问题杨万里说得很清楚：“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江西之诗，世俗之作，知味者当能别之矣。”这个“味”，就是江西派诗歌的风味，诗人们的共性。

首先，我们看到，江西诗派的诗人们大都是聚集在黄庭坚的大纛下，受到他的诗论和诗法的影响。在这些“法嗣”中，洪朋、洪刍、洪炎和徐俯都是黄的外甥，陈师道、高荷亦自言以黄为师，潘大临、李彭等更刻意学习黄诗，几乎亦步亦趋。吕本中诗被认为“似老杜、山谷”，而曾几“诗学山谷，往往逼真”。可见黄庭坚是当时被公认的江西诗派的领

袖。

江西诗派之所以能产生并形成较稳定的文学流派，还有下面几个原因：宋代崇尚理学。黄山谷深通儒家学说，他认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把儒学作为“文章之根”。这种文道观受到当时道学家们的赞许，山谷和江西诗派诗人及其，谨遵诗教的作品，因而也备受推崇。其次是佛教禅宗学说的影响。用禅宗的观点来看，佛教的本质是对佛的“悟”和佛的教义，禅宗的经验能够从老师传给弟子，大师们用直接点化真理的方法，使弟子们获得领悟。这种觉悟本身表现在日常事务之中，因而一切活动都是通向觉悟之道。这些活动（包括作诗）都需要技艺上的完善，通过长期间的刻苦训练，从而使自己彻底改换，达到真正的精通。山谷诗成就颇高，“晚年诗皆是悟门”，由“法”而“悟”，以抵“意在无弦”的最高境界。正由于有法可循，有门可入，加上山谷好扶持后进，故使弟子们景然风从。还有的是，北宋后期政治混乱，党争纷起，文网广罗，江西诗派诗人虽属旧党中人，但多是中小官吏以及布衣隐者，他们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但也不免受到牵连。共同的遭遇使他们走到一起，相濡以沫，彼此作诗唱酬。我们还看到，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得以大量流布，士大夫都偏重书本知识，山谷更强调要“精读千卷书”，才能写得好诗。江西诗好用典使事，也是与此有关的。

江西派的诗歌，其审美价值要高于它的思想内容。早期的江西派诗歌，主要是描写个人的生活经历、亲友间的友谊，也有一些反映时事政治的作品；靖康事变后，诗人们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他们的创作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洪炎、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都写了不少同情民生疾苦，抒发

爱国情怀的好诗。近人有把江西诗派说成是“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诗歌流派，显然是不符合实际和不公允的。

二

我们先要弄清江西诗派诗歌的源流。江西派诗人是在全面地学习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有着独特风格的诗歌的。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唐代诗歌，为江西派诗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黄山谷的诗，“自以为出于《诗》、于《楚辞》”，其实，山谷主要还是规模汉、魏以下的诗人，其中第一位就是陶渊明。陶诗简放自然，“妙在和光同尘”，超乎成法之外，以臻“意在无弦”之境，这是山谷努力追求而未能完全实现的。山谷还对六朝诸家如谢灵运、徐陵、庾信等下过实在工夫，然而，他一生所师法的诗人还是杜甫。他称赞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句法简易”，说“杜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到山谷学杜的宗旨。通过学习杜甫的诗法，以达到“理得而辞顺”的“出群拔萃”的高境。此外，山谷还吸取李商隐和西昆体诗在布局句律上的工夫；宋初的梅尧臣以及稍后一些的王安石、苏轼，都给山谷有益的影响。就这样，山谷在中国古典诗歌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博采众长，努力创新，以自己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一套较完整的诗歌创作技术，指导人们作诗的规矩方法，以至后来形成一个笼罩两宋百年的有力的诗派——江西诗派。宋诗到了山谷，可以说已完成梅尧臣、欧阳修开始的诗风转变，宋诗始

有别于唐诗而在我国诗坛上自树一帜。自此，也开始了历时八百年之久的唐、宋门户之争。

山谷的诗，前人每许其“格高”，所谓“格”，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指诗人的精神格调；一是指诗歌的艺术形式、语言风格。山谷的作品中所表现的诗人自我形象：洁身自好，卓立独行，蔑视功名富贵，关怀家国命运，这是山谷及其作品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钦仰的主要原因。山谷和江西诗派的作家，非常重视诗法技巧，讲究篇章结构的安排，精研句法、句眼；用事运典，力求工切，音节韵脚，皆别出心裁。下面我们简单介绍山谷及江西派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诗法：

一、严密的谋篇结构的法度。诗人把写古文的法度用于作诗，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线索可寻；每句每段，都要安排得法，使之曲折变化。诗歌无论长篇短章，往往采取多层次的结构形式，每一两句，即成一段，随即换意。还须特别注意层次与层次、句与句之间的承接转折关系，如方东树所云：“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有时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断了，上下接不上榫，可是其中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读者要用自己的想象去补足它。这样，文字更简炼，诗意也更含蓄。诗人还非常注意诗歌的起和结。“起无端，结无端，”凡起一句，不知其从何来。在结处，也要别运机杼，摆脱上文的拘系，在意境、句法、用笔上皆作急剧的转换，迥出常人的意表。

二、讲究句法。这是江西派诗的一大特色。所谓句法，山谷为之定下了最高准则：“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

作耳。”(《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二)这种“大巧”的“简易”，是不易做到的，江西派诗歌的主要倾向，还是“句法奇创”。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法，摆脱一切凡近的语词、意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简单归纳，可有以下几点：①、锻炼句意，力求生新。在句子结构上，不按正常的语法规律，把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颠倒，或删去一些句子成分，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中，以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②、重视炼字，讲究句眼。句眼，是黄诗句法特征之一，是指诗句中锤炼得特别精彩的字眼。尤其是五言诗句中的第三字，七言诗句中的第五字，更要“置字有力”。③、重视律诗中对偶句的锤炼。对偶，唐人已下过很多工夫，宋人只得另立新法，别出新意。黄诗的对偶句，自然生动，乍看来象是散文的句子，毫不似对句，但认真揣摩，则觉字字工切，别有风味。④、诗句散文化的倾向，即所谓“以文为诗”。好用铺叙，好发议论，句式采用“散体”。既有诗的优美，又有散文的流畅。

三、特殊的格律声韵。诗歌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风格需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山谷就采用拗律和拗句来表现自己诗歌奇峭的风格。在山谷的三百一十余首七律中，拗体就占了一百五十余首，作者不按照诗律的平仄来撰句，当平字处往往以仄字易之。平仄不调，音节反常，在不和谐中自有其特殊的音乐美。在造句上，每每打破常规，采用特殊的结构形式，有人称之为“拗句”。造五言句，作上一下四或上三下二句型，如“吞五湖三江”(黄庭坚《子瞻诗句妙一世…》)、“石吾甚爱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造七言句，作上三下四或上五下二句型。如“吾二人如左右手”(《还家呈伯氏》)。方东树《昭昧詹言》说黄诗之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可为定论。

三

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在创作时，都恪守一条原则，那就是要“自出己意”以为诗。诗人们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脱去陈腐，无论前人诗中常见的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皆一概摒弃不用。为了摆脱前人束缚，学古人而力求与古人远，山谷特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八字诀，作为写诗的不二法门。所谓“以俗为雅”，是说运用民间俗语、成语以及野史传说入诗。如郭绍虞所指出的：“运用俗语，使诗体散文化，也使诗体通俗化，却不使诗意庸俗化，诗句滥熟化。”（《中国文学批评史》183页）俗语运用得当，便觉朴拙古雅，如黄诗中的“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千里鹅毛意不轻”，陈诗中的“昔日剜疮今补肉”、“拆去补西裳作带”、“经事长一智”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以故为新”，是山谷作诗大法，金针度人，对后世诗家影响甚巨，亦最为时人所诟病。惠洪《冷斋夜话》引山谷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而山谷自己也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就是山谷提出的关于写诗的艺术技巧的两种方法——“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把用典使事的方法，运用于点化前

人诗句上。宋诗是在唐诗丰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修辞手段、词汇使用方面，不可避免地、也是必然地要取法乎唐诗；同时唐诗的意境、形象以至句式结构，也给宋代诗人以启发。所谓“点铁成金”，着重在“取古人之陈言”，也就是说，摹拟、改易古人诗中的实体性的东西——词汇、语句，并赋予新的意义，甚至可把陋句点化为佳句。而“脱胎换骨”，目的是“追无穷之意”，也就是说，摹拟、改易古人诗中的意境、情调、韵味，用自己的方式更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以故为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宋诗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风貌，也是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子推陈出新的创作思想不无关系的。

四

除黄庭坚外，江西诗派重要的代家还有陈师道、晁冲之、韩驹、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他们的诗论、诗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他与山谷齐名，合称“黄、陈”。他从小学诗，年届三十，始识山谷，遂“尽焚其稿而学焉”。后山学山谷，自有其深谋远虑，他的目标是学杜，但他认为学杜不能躐等，必须以黄为阶梯。他说：“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因为黄诗有规矩法度，而这规矩法度又是总结了杜诗后提出来的，学黄有得，便可“时至骨自换”。实践证明，后山的道路是走对了的。他学黄

而不摹仿黄，才是真正的善学。他曾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象之，非善学者；学者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象之乎？”这些见解，无疑是发展了山谷的诗论的，试读后山的一些名作，便可知他的确是理论与实践相符：“巴蜀通归使，妻孥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忍问何如。身健何妨远？情亲未肯疏。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寄外舅郭大夫》）学杜而得其神，断非明七子所能梦到，这就是诗人所主张的“立格”。又如：“去远即相思，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示三子》）诗歌感情极朴挚，语短而意长。他的《谢赵生惠芍药》诗：“九十风光次第分，天怜独得殿残春。一枝剩欲簪双髻，未有人间第一人。”极写牡丹花的美艳，又惋惜找不到配戴此花的第一美人，暗寓怀才不遇之意，诗人的“立意”便高。至于用字，则更是后山的看家本领了。与山谷相比，后山下字似乎比山谷更准更稳，求深而不求奇，尤其重在诗眼的锻炼，如“潜鱼聚沙窟，坠鸟滑霜林”（《宿济河》），“云日明松雪，溪山进晚风”（《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九日寄秦觏》）等句中的“聚”、“滑”、“明”、“进”、“欺”、“负”，都是非常精警的字眼。世传《后山诗话》中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更是江西派的重要诗论。谈到“换骨”，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学”，一是“悟”，后山指出：“规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规矩则无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通过长时期的学习，一朝豁然贯通，悟得真理，便可“换骨”，艺术也就产生一次飞跃。由“学”而“悟”，是学诗的过程。这个

观点，与山谷的由学古人到自成一家的主张并无二致。

韩驹认为，作诗的基本方法是“禅悟”。他的名作《赠赵伯鱼》诗说：“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他还说：“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韩氏把“遍参诸方”作为学诗的第一步骤，通过广泛的学习，才能“一朝悟罢”，达到“信手拈出”都能成章的化境。

韩驹以禅喻诗，开了严羽《沧浪诗话》中“禅悟”之说的先河。他把江西诗派的“法”跟禅宗的“悟”结合起来，如谈到写诗“下字”的方法时，为什么“有二字同意而用此字则稳，用彼字则不稳”？韩氏云：“至此惟可默晓，未易言传耳。”这就是说，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创作实践，才能悟出下字微妙之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韩驹的诗，有些写得比较自然超迈。如他的名作《夜泊宁陵》诗：“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老树挟霜鸣窣窣，寒花垂露落毵毵。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自能在东坡、山谷之外，自成一家了。

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与“悟入”，是江西诗派诗法的最精彩之处。他强调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这是对山谷诗法的重要发展。潘大临曾指出下字要“响”，而吕本中却认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皆响”。怎样才能做到“活”呢？那就要“悟入”：“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得此理。”“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

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他主张先在杜甫、苏、黄中学习“体式”，然后遍考各家的诗，工夫才能度越前人。这可以作为江西诗派诗论的总结：从有法而到无法，从学而到悟，以达到“无意于文”的最高之境，这才是江西诗派的诗论和诗法的精华所在。

曾几之学，出于韩驹和吕本中，“句法相传共一家”，而南宋诗人杨万里、陆游、萧德藻等又出于曾几。他们作诗，先有了江西诸子所总结的诗法作指导，然后又摆脱成法的拘束，有所自得，各成风格而自立门庭。“入室操戈，正是苏轼一派诗论的主张，其实也是江西诗人的主张。”对于一切真正的诗人来说，法，只不过是诗歌的外在形式，而不是诗歌的本体；法，只能为诗人所用，而不应成为诗人的束缚。优秀的诗人，总是能熟练地掌握诗法，游刃有余的。当他达到高度的完善时，手和心，诗法和诗的内容、感情都彼此融合在一起，法的本身也不复存在了。

后世论者，特别是近代学者，对山谷及江西诗派诸子颇多非议。他们不满宋人对诗歌艺术形式的精巧和凝炼的刻意追求，把那些最具宋诗特色的东西——“奇正相生”的谋篇法度，特殊的句法字法，古拗的音律——统统斥之为“形式主义”，其实，没有形式，也就没有诗歌。诗人们对形式的探索和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五

选注，是整理古籍的主要方法之一。目前出版了的古代

诗歌的选注本不少，不外是作家个人选集和按时代编选的选集两种类型，而以诗歌流派为体系的选本似还未见。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主编的这套古代文学欣赏丛书中，有好几种是诗派诗选，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的尝试。

本书入选的诗歌，当是江西诗派诗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能通过这个选本，体现江西派诗歌的主要风貌。

作者按出生先后排列。有些生年不详的则按其交游行第约略编排。入选的作品，排列次序是先五七言律、五七言绝，后五七言古诗，以便读者对同一诗体的作品进行比较。

每位作者名下都有详略不等的小传，着重介绍其诗歌创作的成就或特色。每首诗都有注释，对不常见的诗词、典故及人物、事实，均作简明扼要的训释考核，较艰深的诗句则加以白话串解。注释前边的说明，指出诗的时代背景、创作意图和艺术特色，重要的作品则适当摘引有关的参考材料或前人评语。

目 录

黄庭坚 (三十七首)	(1)
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	(2)
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 (五首选一)	(3)
次韵裴仲谋同年	(5)
郭明甫作西斋于颖尾, 请予赋诗二首 (选一)	(6)
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7)
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	(8)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10)
题落星寺岚漪轩	(11)
次元明韵寄子由	(12)
再次韵寄子由	(14)
登快阁	(15)
寄黄几复	(17)
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	(18)
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	(19)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	(21)
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 (二首选一)	(22)
题郑防画筭 (五首选一)	(23)
蚁蝶图	(23)
乞猫	(24)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	(25)
六月十七日昼寝	(26)